

新中国农垦的区域差异与地方适应

——云南农垦的非军垦之路

文 婷

(普洱学院 人文学院, 云南 普洱 665000)

摘要:农垦系统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存在,新疆、黑龙江、广东、云南四大垦区分布广阔,各有特点,其中的云南垦区起步稍晚,受当时“冷战”背景的影响,其生产内容为战略物资,垦区移民人口构成复杂,地域分布集中。经过不断的探索和整合,云南农垦走上了特殊的非军垦发展之路,是我国屯垦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云南农垦;非军垦;东北农垦;西北农垦

中图分类号:F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5)05-0030-06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5.05.007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Local Adaptation about Reclamation of New China

—The Non-military Reclamation in Yunnan Province

WEN T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Pu'er University, Yunnan Pu'er 665000, China)

Abstract: The system of reclamation has long history after the new China was founded and the four areas of reclamation in Xinjiang, Heilongjiang, Guangdong and Yunnan distribute broadly with different features.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hree, the reclamation in Yunnan began later and the production was strategic materials, the structure of the migrants was complicated and the distribution was centralized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Cold War. The reclamation in Yunnan was importa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clam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 non-military reclamation.

Key words: reclamation in Yunnan province; non-military reclamation; reclamation in the northeast of China; reclamation of the northwest of China

农垦系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存在,它与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生产运动存在着密切联系,同时也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是几千年的屯垦思想在当代社会的延续和发展;它是中国农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长期以来向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商品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畜产品;它积累了经营大农业的经验;它在农业机械化方面发挥了示范作用;它拥有数量庞大的农业企业职工队伍。1956年成立的农垦部统一管理包括新疆、黑龙江、广东、云南四大

垦区及其他地区的国营农场。^{[1]15}四大垦区分布于广阔边疆,并各具特点。其中,云南垦区在建立及起因、发展的历程、人口构成与区域分布等许多方面都与东北、西北农垦有所不同,是新中国农垦特殊而又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建立时间及起因的差异——新中国阶段性需求的体现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垦系统的重要垦区,无

收稿日期:2015-09-18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统一政令与地方需求:云南农垦变迁史研究”(YB2013046);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支援边疆建设’:共和国十七年边疆移民研究”(2013C039);普洱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从‘支援边疆建设’到‘西部大开发’中的边疆移民与社会”(RCXM010)。

作者简介:文婷(1982—),女,云南勐腊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云南地方史及移民研究。

论是北大荒的粮食、新疆的棉花还是云南的橡胶,都是在满足国家需要的前提下,由政府统一部署实施的。但三者建立的时间先后有别,建立的原因、生产的主要内容也不尽相同:东北和西北农垦主要应景国内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一个生产“吃”的物品,一个生产“穿”的材料;云南农垦则是为解决国家对战备物资——橡胶——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

东北农垦起步最早。东北地区国营农场是于1947年秋天开始筹备,1948年建场。^{[2]94}1947年,为了支援解放战争,巩固东北根据地,东北各省农业部门开垦荒地并创建了一批国营农场。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大批荣誉军人和复员转业军人需要安置,越来越多被解放的国民党官兵也愿意留下来劳动就业,于是在东北荣军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了一批以安置荣誉军人为主的荣军农场和组织“解放军官”生产劳动的解放团农场。^{[1]8}1954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让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二师集体转业,由其组成八千官兵的垦荒大军,挺进三江平原;1954—1956年,经中央军委同意,铁道兵司令员王震将军命令铁道兵复转官兵近两万人到北大荒安营扎寨、开荒造田。^{[3]77}

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疆独具特色的农垦组织,它以部队集体转业和工作团进疆为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新中国成立伊始,面临着医治战争创伤,克服经济困难,迅速恢复生产的困难,发展农业显得尤为迫切,而随着战争的结束,大量军人也需要安置。1949年12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发布《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2]19}1950年1月,新疆军区贯彻执行这一指示,发布大生产命令,要求驻疆部队除留一部分兵力担任国防、进军西藏、肃匪平叛、维护社会治安外,组织11万指战员投入大生产运动。1952年2月,中央军委发布整编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分别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批准解放军31个师转为建设师,并以其中参加农业生产的15个建设师为主建立了一批农场,自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初次迁移人口基本确定。^{[4]65}1954年10月,中央政府命令驻新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六军大部,第五军大部,第二十二兵团全部,集体就地转业,脱离国防部队序列,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接受新疆军区和中共中央新疆

分局双重领导,兵团开始了正规化国营农牧团场的建设,由军队自给性生产转为企业化生产,并正式纳入国家计划。1957年12月,国务院下达指示,要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有军籍人员凡未办理转业复员手续者立即补办手续,不再隶属正规的军队序列,成为一支不穿军装、不拿军饷、不吃军粮,又保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形式的军垦部队。^{[4]68}

在东北和西北,军垦是农垦系统建立和发展的基础,大批退转复军人是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农垦职工。军垦农场轰轰烈烈开展的同时,国家也大幅度地投资,迅速发展大型农场,农业部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都陆续建立了地方国营农场。

20世纪50年代前期,云南也有一些就地安置军人的军垦农场,以及一些地方发展农业的小型国营农场,但数量不多。云南农垦起步于1951年9月,云南省农林厅林业局成立林垦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橡胶种植不成规模,橡胶工业原料不能自给。橡胶进口“1946年为2.11万吨(t),1947年为3.89万吨(t),1950年为7.15万吨(t)”^[5],朝鲜战争爆发后,橡胶的进口也无法保障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尝试克服困难种植和生产橡胶。1951年,成立广东农垦及海南垦殖分局,建立国营农场。当时,陈云强调指出:中国别的地方也有宜于种橡胶的,产量虽不像南洋群岛那样高,但是比没有强。我们是非常需要橡胶的,今后要尽可能多种。^[6]根据中共中央建设华南橡胶生产基地的战略决策,政务院在1951年8月31日召开的第100次政务会议上做出了《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要求1952—1957年内以最大速度在广东、广西、云南、福建、四川等5个省区种植巴西橡胶及印度橡胶770万亩(51.3 hm^2),^{[7]337}随即,在华南地区加大、加快橡胶的发展,并在西南主要是云南调查产胶植物资源。为此,云南省农林厅林业局于同年9月成立了林垦处,并在滇东南金平(勐拉)、滇南普洱(车里)分设了两个林垦工作站,在滇西保山设立林业办公室(下设林场)。10月,以著名植物学家秦仁昌、蔡希陶及冯国楣为首组成了三个调查队,分赴滇西、滇东南和滇南地区进行产胶植物资源调查。^{[8]257}

1953年1月,西南局派一批干部到云南筹建云南省垦殖局;2月,云南垦殖局成立,云南农垦正式创建。从1956年开始,云南省正式布点建立垦殖场

发展橡胶及热带作物生产。1957年3月,农垦部王震部长来云南视察后,将省热作局改为省农垦局,由农垦部和省委双重领导,原垦殖场则改为国营农场。同年,新建国营农场5个,接管军垦农场和地方农场13个。^{[8]257}这样,以种植和生产橡胶等热区经济作物为主的国营农场成为云南农垦的主体部分。

综上,三大垦区建立的时间有先后之分,阶段递进,分别应对了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及经济建设的不同需求。其中,云南的解放稍晚于东北和新疆,其农垦事业起步也更晚,但后来却以“中国第二大天然橡胶基地”之称而位列农垦部的“四大垦区”之中。

二、直线发展与曲折发展的差异——局势的影响

全国管理农垦或国营农场的机构,最初是1949年底农业部设立的垦务局,1950年改为国营农场管理局;1952年12月,农业部决定成立国营农场管理总局,进一步加强对全国国营农场的管理;195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农垦部,并由王震任部长,^{[1]14-15}全国的军垦农场和地方经营各类农场统一归口管理。1949—1955年,大批军人成建制参加生产建设,建立了许多军垦农场,这是农垦部成立的大背景,但是必须注意到除了大批军垦农场外,还有以其他形式存在的农场。

1951年,中国还处于初步稳定政权的过渡时期,生产凋敝,经济尚未恢复,外部环境严峻,想要自行生产橡胶,但资金、设备、技术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因此,云南省成立林垦处后,并未开始橡胶垦殖。这时的苏联,同样面临自身无法生产橡胶,在“冷战”的环境中也很难从其他国家进口橡胶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经过权衡和谈判,最终于1952年9月15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植胶、割胶、制胶以及售与苏联橡胶的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协定》签字生效后,政务院在年底便决定正式开辟云南植胶区,勘察适宜植胶区域的工作提上日程。1953年1月,在前期产胶资源调查的基础上,西南局组建了中苏专家调查队分赴蒙自(金平、河口)、普洱(西双版纳)、保山(德宏)地区进行橡胶宜林地调查。1953年2月,云南省垦殖局成立。同年3月至7月,中国科学院有

关专家、东北森林测量队和西南有关高等院校的教授、讲师、学生以及由垦殖局和当地政府配给的行政领导和卫生、会计人员共1306人,到保山、蒙自、思茅三个地区调查勘察,首次测出宜林地1.5万公顷(hm^2),^{[8]258}随后在这些测出的宜林区域开始橡胶树的试种工作,由此揭开了云南农垦事业发展的序幕。

从林垦处到后来垦殖场建立的过程来看,云南垦区的创建与当时的“冷战”背景密不可分,而后来这一垦区的发展道路也由于国际形势的影响而曲折多变,经历了自由探索试验、创业奠基、曲折缓进、不断发展的过程。

云南农垦建立时正处于朝鲜战争时期,我国急需橡胶,《中苏橡胶协定》的签署进一步促成了云南垦殖局的建立。但实际当时在云南规模种植橡胶的条件仍不成熟,中共中央也意识到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情况复杂,交通不便,困难较多,云南南部自然条件虽可植胶,但橡胶生长、产胶情况尚需进行科学试验。1953年4月底,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指示:“云南植胶涉及兄弟少数民族,应谨慎从事,应该考虑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压缩勘测计划”。^{[7]340}另外,早期的华南橡胶因种植任务大、时间紧,对生产的土地条件、物资供应考虑不周,出现成本高、质量低的情况,而1953年8月朝鲜战争结束后,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有所松动,“锡兰就公开同我们订立了橡胶贸易合同”。^{[3]130}综合这些情况后,195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基本同意关于暂停云南植胶问题和紧缩华南植胶计划两个指示草稿,^[9]云南橡胶垦殖工作收缩,转入小规模试种,除留少数干部和科技人员成立云南特种林实验指导所(后改为云南热带作物试验指导所)继续进行橡胶等热带作物的小规模试种外,云南垦殖局及所属机构全部撤销。^{[7]340}

1955年,因国家对橡胶和偿还苏联贷款的紧迫需求,云南垦殖场再次得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视与支持,^[10]农业部热带作物司通知,云南除继续进行橡胶树的试种观察外,同时进行新建垦殖场的勘测规划设计,为生产性开发做准备;1956年,云南开始正式布点建立垦殖场发展橡胶。1957年3月,云南省热作局改为省农垦局,实行农垦部和省委双重领导。原垦殖场改为国营农场,同年又新建国营

农场5个,接管军垦农场和地方农场13个,职工达到9930人……当年定值橡胶苗733.3公顷(hm^2),两年累计达到1033.3公顷(hm^2)。^{[8]258}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60年代中期,云南农垦国营农场边生产边建设,发展迅猛,1962年至1966年共种植橡胶27.6万亩(1.84hm^2),基本实现了良种化,生产整齐,保苗率高,成为云南第一批建成的稳定高产胶园。^{[7]342}云南农垦从此奠定了以天然橡胶为主体的格局,后来又发展成橡胶单株及单位面积产量居全国之首的第二大天然橡胶生产基地^{[11]86}。

从其发展历程来看,由于主要生产的橡胶是战略物资,而非满足国内需求的生活物资,因此云南农垦的建立过程受复杂国际形势的影响较大;“冷战”结束后,天然橡胶作为经济作物,受到世界金融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较为突出,农垦发展也与国际局势紧密联系。与劳动密集型垦荒和发展机械大农业的东北和西北农垦相比,云南农垦在创建后并没有直线向前发展,而是经历了收缩和转型,最终才定型为大规模生产橡胶。

三、人口构成与区域范围的差异——地方适应

农垦系统是接纳移民的重要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计划迁移的人口大部分移入国营农场。无论是北大荒的粮食、新疆的棉花还是广东、云南的橡胶农场,几大垦区的生产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云南农垦不是以军垦农场为主体建立的,因此其人口构成情况较东北、西北更为复杂。同时,云南农垦在省内的分布区域上具有集中连片分布于南部、西南部边境的特点,与西北、东北广泛分散的格局不尽相同。

在机械大面积开荒的条件下,发展大型农业的粮食或棉花农场仍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尽管军人成批转业参加生产建设,人员还是不够,后来又由国家组织迁入了大批人口。橡胶垦殖也需要人力,但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橡胶垦殖主要在海南岛,而云南开展的产胶植物资源调查、小规模试种、宜林地勘测等工作,需要的主要是科研技术专家和少量管理人员,劳动力问题并不突出。1958年,中共中央发起“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运动”,经国务院批准将内务部移民局合并到农垦部,负责移民工作。^{[1]460}其间产生的农垦

移民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是罕见的,据统计,“1958年至1961年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农场工作的青年共93万人,随迁家属43.8万人”。^{[1]17}然而,运动最初并没有做出移民云南的计划。为了大力发展农业以支援工业的需要,同时缓和内地农村紧张的人地压力,这次移民的重点在西北和东北等具有广大可开垦土地,能够生产粮食和工业原料的地方。

但是,1958年的云南农垦已经开始生产性开发,1959年,农垦部、化工部党组《关于大力发展天然橡胶的报告》又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除现有的120多万亩($8\text{万多}\text{hm}^2$)橡胶外,拟再发展1000万亩($66.6\text{万}\text{hm}^2$)。其中广东650万亩($43.3\text{万}\text{hm}^2$),广西100万亩($6.6\text{万}\text{hm}^2$),云南250万亩($16.6\text{万}\text{hm}^2$)”。按照报告提出的发展规模,“主要植胶区如海南岛及云南南部劳动力均极缺乏”。^{[11]782}历史上,云南开发较内地晚,人口自然增长缓慢,富余劳动力也不多,而且宜胶区的各民族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橡胶种植能够带来收益,加之长期受封建领主制经济的影响,生产积极性不高。本省的劳动力无法满足缺口,因此在这次“支边”运动的契机下,云南向中央打报告后,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从湖南原决定支援新疆自治区的劳动力中抽调5万人给云南的通知》。云南省与湖南省按规定签订《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协议书》后,湖南青年到云南省边疆农场参加建设。1959年底至1960年初及1960年底至1961年初,来自湖南醴陵和祁东的3万“支边”移民分两次迁入,有学者将其称为“橡胶移民”。^[12]湖南移民的迁入,在当时极大地增强了发展橡胶生产的力量。1958—1960年,云南垦区新建国营农场27个,接管地方农场37个,使国营农场猛增至90个,地州管理农垦国营农场的机构——临沧、德宏、红河、思茅(辖西双版纳)、文山农垦局也相继成立。^{[8]257}虽然3万移民在当时整个“支边”运动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但却是云南农垦最大规模的一次省外人口集中迁入。

为了解决生产所需的劳动力问题,云南各农场在不同的年代分别吸收了自流人口、军队复员转业官兵、海外难侨等,并自行到省内人口较多地区的农村招工,在20世纪80年代还吸纳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村寨“并寨进场”。东北、西北农垦的人口,主要来自于各种大的运动、政策,如部队成建制转业、

“支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基本上是集中迁移集中分配的。云南农垦移民在来源和数量上则更为分散,由于吸纳了相对较多的省内移民和当地民族,所以尽管与当地村寨存在一些矛盾,但云南的农场仍不断整合当地文化、云南文化和外来文化,并非单纯的“移民社区”或“空降社会”。

在地域分布上,黑龙江垦区的农场分布在黑龙江省12个地(市)69个县(市、区),横跨小兴安岭南麓、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地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辖13个农业师和1个建工师,总共174个农牧团场,遍布新疆14个地州市,全面融入新疆社会。^[13]东北和西北两地农垦在各自省域内广泛分布,遍及所有县市,云南农垦则不然。据统计,至1999年,云南农垦国营农场,分布在昆明市和西双版纳、红河、临沧、德宏、思茅、文山、保山等7个地(州)、28个县(市)。^{[8]258}从地域上看,除省会昆明外,这些农场全部在滇南及滇西南,这种集中连片分布在总体规模上虽然不及西北、东北的分散分布,但在发展地方经济、建设边疆社会方面却更容易集中力量、发挥作用。

总之,云南农垦在省外移民和地域的规模上不如东北、西北农垦,但在人口构成上更为复杂,在地域分布上更为集中,有利于边疆民族融合、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开展。

四、统一政令与地方需求——云南独特的非军垦之路

中国农垦系统的几大垦区都是计划经济时代在统一政令下建立的,但从以上诸方面看,云南农垦与西北、东北垦区的建立及发展有较大不同,其主要生产物资也更具有特殊性。非军垦的发展,使云南农垦在移民及地域范围上不及东北、西北农垦的规模,与浓墨重彩的号称“十万官兵”“百万知青”的“进军北大荒”和“开发大西北”运动相比,地处西南的云南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但是相比东北、西北农垦以军队建制建立、以垦荒和生产衣食等生活资料为主,云南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走上了“非军垦之路”,以发展橡胶为主,建立和发展起非军事化的国营农场。

整个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军垦轰轰烈烈开展的时期,军垦农场的建立得到了各方关注。1958年,中央政治局下达成会议通过的《关于各种军

垦农场的意见》,指出:军垦既可解决军队复员就业问题,又可促进农业的发展,在有些地区还可以增强国防和巩固社会治安。因此,在有大量可垦荒地、当地缺乏劳动力,又有复员部队可调的条件下,应实行军垦。中国历史上有诸多屯垦形式,但都以兵屯为主,新中国也概莫能外。尽管如此,其他形式的屯垦在政权经济建设、地方社会发展、民族融合等发面仍有自己的长处和特点,也具有军垦或兵屯不具备的灵活性,而云南农垦恰恰进行了新中国非军垦之路的实践。

1957年农垦部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全国农垦系统在体制上基本保持一致,各种政策和管理都是整齐划一的。1978年,为了加强对国营农场的管理,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农垦总局,其中,黑龙江、新疆、广东、云南4个垦区实行国家农垦总局和省、自治区双重领导,以省、自治区为主。^{[1]70}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的深入,计划经济体制下过分整齐划一的管理不再符合新时代的需求,于是“四大垦区”开始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其中新疆和云南的发展各有特点。

目前,兵团体制的农垦仅在新疆存在,这一区域也曾有过非常短暂的“非兵团”——农垦总局时代(1975—1981年),但鉴于新疆边境团场的防务责任,又于1981年12月决定恢复兵团建制,名称由原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改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实,从最初的建立及人员构成来看,新疆农垦的军事特征一目了然——它最初全由转业军人组成,后来又不断吸纳全国各地的复员、转业军人、支边青年等移民作为人员补充。考虑到兵团中的大量干部和职工拥有部队经历,以及它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能够十分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所以重新组建兵团就成为符合当时国家战略需要的举措。研究新疆兵团的学者认为,新疆兵团“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集中了生产、行政、军事等职能,旨在对新疆实行更加有效的全面治理。在考察这一特殊的国家组织时,要将新疆、兵团同时放入中国,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否则就难以理解在市场经济盛行的今天,为什么还要保留兵团这种看似计划色彩浓重的组织和体制……所以,对新疆兵团的评价,不能使用一般经济意义上的衡量方式,而应更加侧重它的政治效能”。^[13]

云南农垦在“冷战”结束后,其政治性和战备功能已有所削弱,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主要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而非军垦的发展道路则使其成为农垦改革及改制中 fastest 最完全的垦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云南农垦调整产业结构,巩固提高以橡胶生产为主的第一产业,大力发展橡胶制品、食品、电力、建材、医院等第二产业和商贸、物资供销、旅游服务业等第三产业。^{[8]260}1980年12月,云南省总局制定了《云南农垦企业扩大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对企业的生产计划、利润留成、资金使用、产品销售、工资支付形式及奖励办法、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物资购销方面给予了一定的自主权。1983年,根据改革形势的发展,云南省农垦总局改为云南省农垦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原各垦区分局改为分公司。^{[7]344}

1996年2月,云南省政府批准组建云南农垦集团,并成立云南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8]269}2002年10月,云南农垦被云南省委、省政府正式纳入全省10个优势产业和重点行业整合重组范围。2002年12月,云南省国企改革领导小组批准了云南农垦改革方案,云南省政府于2003年2月批复了这一方案,云南农垦系统全面推开了在农业生产一线的职工家庭承包经营、实行农场政企分开、组建云南天然橡胶产业股份公司等工作。2007年,云南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深化改革和加快农垦发展的若干意见》(云发〔2007〕12号);2009年的云发〔2009〕19号文件,提出将39个农场划归所在州(市)实行属地管理,撤销农垦分局,人员和资产整体划归所在州(市),改造重组云南农垦集团公司,农场普遍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等意见;2010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农场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机构编制意见等5个方案》(云政办发〔2010〕108号),并在当年12月底完成了云南农垦各个农场的全部交接工作。

1965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到云南视察工作时曾说:“农场,你们要用土办法,现在有新疆的道路,有黑龙江的道路,你们要有云南自己的道路。新疆投资几十个亿,你们如果一开始就搞大的,一定就是几个亿,那就行不通。……军垦的道路是成功的,但是有缺点的,你们要创造一种自己的道路,几年之内国家补贴,以后就可以上缴利

润。你们要创造一种云南道路。”^[14]邓小平提出的“云南道路”的方向,经过50多年的摸索,形成了独特的非军垦发展之路。云南农垦是在中央统一政令与地方具体需求的双重互动的作用下形成的,其发展的大趋势受国家宏观调控、经济计划、政策影响和行政制约。然而,在统一政令的实施过程中,云南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调整适应,并在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与民族融合等方面具有灵活、适应性强的特点。云南地方的这种选择与适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较为广阔且存在区域差异的国家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农垦之路有特殊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编辑部. 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 [2]农垦部政策研究室,部国营农业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农经所农场研究室. 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M]. 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 [3]翟振武,段成荣. 跨世纪的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M].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
-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新疆通志·生产建设兵团志[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 [5]石万鹏. 中国工业五十年:新中国工业通鉴:第1部[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1519.
- [6]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 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29—130.
- [7]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 当代中国的云南:上[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 [8]中国农业全书编辑委员会. 中国农业全书·云南卷[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
- [9]王元辅. 云南五十年:中共云南省社会主义时期大事记[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30.
- [10]文婷. 1952年《中苏橡胶协定》与20世纪50年代的云南农垦[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3(2):85—89.
- [11]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云南省志·农垦志[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 [12]苍铭. 云南边地移民史[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 [13]魏英杰. 边疆治理中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N]. 文汇报,2015-7-17(24).
- [14]当代云南编辑部.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49—2006)[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264.